

【译 文】

俄罗斯的“族群复兴”： 后共产主义秩序中地区领导人的分离行动主义

Russia's "Ethnic Revival": the Separatist Activism of Regional Leaders in the
Postcommunist Order

丹尼尔·特瑞斯曼 Daniel S. Treisman 著，孟红莉译

《World Politics》Vol.49, No.2 (January, 1997): 212-249

一、导 言

从 1990 年开始，俄罗斯经历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族群复兴”。从西伯利亚东部的萨哈共和国到位于高加索山脉斜坡上的阿迪格共和国，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个少数民族（minority nationalities）都声称要得到更多的权利、特殊待遇以及宪法上的承认。族群地区各个领导人的要求异常广泛（everything），范围从更多的经济自治到完全独立。虽然非俄罗斯族的民族群体（non-Russian nationalities）大约只占到了俄罗斯联邦总人口的 18%，但是最近其他一些共产主义多族群联邦的解体，引起了俄罗斯和西方世界对俄罗斯联邦未来稳定性的担忧。车臣战争展现了民族政治斗争（nationality politics）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的一个范例。

这篇论文试图解释俄罗斯突发的族群政治运动的原因，探求俄罗斯近期的经历对族群与民族行动主义（ethnic and nationalist activism）普遍理论的影响。在俄罗斯及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族群复兴之后的几十年中，后殖民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很多地方也发生了族群复苏。这激起了大量的理论争论：关于族群认同和民族主义运动基础的理论争论。²俄罗斯最近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机遇，使我们有机会能够确定现有理论的解释力（the scope of existing theorise），具体来讲，就是从世界其他地方总结出的普遍理论是否对俄罗斯族群政治具体情况具有解释力，或者说是现有证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族群-民族主义行动的急剧增长。

族群复兴是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的复杂社会现象。实际上，在因变量（引起变化的原因）的选择上，族群和民族主义学者们面临一种困境，就是由于面临太多的因素而难以抉择。一些学者试图解释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理或社会情境中，个人为什么会接受特定的族群认同含义。³其他一些学者深刻地分析了社会运动、潜在的族裔民族群体如何动员等有关问题，并且分析政治组织的出现为什么代表了特定的群体，而不是代表其他群体⁴。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去解释族裔民族群体及其领袖的政治行为（political behavior）——与中央（the central state）打交道的战略和计策。

² 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多，无法一一引述，有影响力的文献应当包括有：Rupert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Karl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Reviv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Michea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London: Routledge, 1975); Robert H. Bates, "Modernization, Ethnic Competition, and the Rationality of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 Donald Rothchild and Victor Olorunsola, eds., *State versus Ethnic Claim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3);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Walker Connor, *Ethno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³ 例如，Geertz; Michael Banton, "Modelling Ethnic and National Rel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January 1994).

⁴ Margaret Levi and Michael Hechter, "A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to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Ethnoregional Political Parties," in Edward A. Tiryakian and Ronald Rogowski, eds., *New Nationalisms of the Developed West*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5), 特别是 134-36 页。这个主题的很多工作得益于 Tilly 的资源动员理论，参见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Englewood Hills, N.J.: Prentice Hall, 1978).

最后，一些学者试图解释族裔民族主义行动的结果，其最显著的结果就是分离和族群冲突。⁵

在这里我努力去解释，在族群异质性的国家里，那些以族群名义定义的地区和共和国（ethnically defined regions and republics）领导人的策略。当一些族群地方的领导人积极要求更多自治的时候，其他一些族群地方的领导人则是令人惊奇地表现得很温顺。我认为，对于地区领导人的策略来讲，如下变量可能最有解释力：领导人或居民潜在的族群认同、民族主义组织的范围、领导人的个人兴趣或资源、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和薄弱之处。

俄罗斯提供了特别丰富的情境，使我们能够有证据来比较关于族群复兴的不同假设。在俄罗斯的 89 个联邦主体中，有三分之二是以族群来定义（ethnically defined）的共和国、自治地方或者自治省。这些地方在文化、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面积、族群人口均衡性等方面差异很大，在很多其他潜在的相关因素等方面的差异也很大。并且，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有了普遍增长的表象下面，对于更大自治权力的渴望这个问题，各族群地区的领导人实际上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尽管由于个案的数量有限和很多潜在解释因素的存在限制了能够得出有把握的结论，但是俄罗斯族群政治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将理论推测用事实来进行经验检验的绝好机会。

和俄罗斯其他地区一样，族群地方和族群共和国的领导人坚持或大或小的要求，范围非常广泛。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这些领导人的要求看成是沿着一个“分离行动主义”（“separatist activism”）谱系上的不同的点。我把一些可能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的要求也包括进了同一个谱系。例如，当两个共和国（车臣共和国和鞑靼斯坦共和国）已经提出从莫斯科完全独立出来时，多数其他地方则很明显地只是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寻求更多的自治权。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研究策略，其理由有两个。

第一，尽管各个族群领导人的目标在重要方面确实呈现出很大不同，但是这并不象他们的行动那样能够被直接观察到。要求独立的领导人和那些仅仅想要经济特许权的领导人都可能会策略性地故意误传他们的目标：独立寻求者们会预先阻止中央的压制，经济特许权的寻求者们会通过他们的要求去施加压力。同时，在谈判的过程中，伴随着运动被中央的回应所激化或者平息，其目标通常会扩展和缩小。因此，仅根据他们公开声称的目标来划分他们的政治行动，看到的通常就是一些具有欺骗性的和变动性的目标。第二，可能会有人会争论说，宣称独立的行动（不管是否真实）与要求更多的自治权利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是：使一些族群领导人倾向于独立的因素和使另外一些族群领导人倾向于寻求自治权的因素是不同的。我将考察赞同和反对上述观点的证据。

我集中讨论地方领导人的行为，并假定一个国家（state）有地方划分权利（a state with some territorial subdivision of power）。这样，问题的框架就既能适合联邦制的国家，也能适合有地方政府的族群异质性的单一国家。（前苏联的俄罗斯是否能够被精确地描述为一个 Riker 或者别人定义的联邦，这个问题仍然还是在争论中。⁷但是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则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很多国家（states），不管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族群是通过地方领导人和中央领导人的互动来参与政治的。在这样的情形中，地方领导人在两种政治场域（当地和中央）中处于不稳定状态，在二者当中都要扮演角色并达成协议。通过分析“嵌入”或者“双边”博弈（the nested or two-level game）能够解释他们的选择，他们参与这样的博弈，在由地方全体居民的特征所决定的客观现实中（under constraints and payoffs determined by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populations）与中央进行谈判。⁸

⁵ 例如，V. P. Gagnon Jr., “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Case of Serb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Winter 1994-95); Ted Robert Gurr, *Minorities at Risk: A Global View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s* (Washington, D.C.: 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⁶ 我这里使用的“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这个词，是指沿着上述分离行动主义谱系提出要求的领导人——并不必然是指那些公然地为他们的族群地区要求完全自治的领导人。

⁷ 例如，参见 Steven L. Solnick, “Federal Bargaining in Russia,”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4 (Fall 1995)。

⁸ George Tsebelis, *Nested Games: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Summer, 1988).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就要讨论关于民族主义者行动和分离主义者行动的主要理论，以及它们所蕴含的关于俄罗斯族群地区的假设。本文的第三部分比较了在 1990 年至 1994 年间各地区领导人的可以观察到的分离行动主义程度，并且建立了一个综合指数。在本文第四部分，通过实际结果来讨论从第二部分的理论中形成的假设，而且用简单的统计工具给证据（the evidence）赋值。最后，第五部分进行了总结，得出结论：俄罗斯的后共产主义经验对于从理论上理解族群异质性国家中族裔民族主义者的行动主义有哪些帮助。

二、分离行动主义的有关理论

为什么一些联邦主体（subnational）的领导人为他们的地区宣称独立自主权、要求更多宪法上的权利、坚持对地方财产和矿产资源拥有管辖权利、采用旗帜和其他的符号、宣布独立、拒绝中央法律的权威性，并从事对现存制度和协议表示怀疑的大量行动呢？为什么其他一些领导人则没有进行这样的行动呢？不同的理论从四个方面集中来讨论相关因素。

族群的自我认同

一些学者将地方领袖的分离行动主义程度与少数族群成员中族群的、文化的、语言的、宗教的自我认同的范围和强度联系起来。这些族群的、文化的、语言的、宗教的共性提供了将社会运动或者政治运动变得具体化的标志。对于一些理论家来讲，从共享的自我观念到政治行动的路程是很短的。根据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说：“现代的族群的情感……涌现在匿名的原子化的人群中，并且它显然能够几乎毫不费力地产生它自己的组织。”⁹

但是如果分离行动主义的关键是这样的自我认同，可能就会有人提出疑问：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中，是什么决定了族群认同的强度和范围。格尔茨和希尔斯（Shils）观点是：这样的标志是被社会存在所历史地决定了的“假设事实”（givens），这些社会存在总是（always）伴随着特定的强度被人们所经历。¹⁰ 在格尔茨的表述（formulation）中：

血缘、语言、风俗习惯等这些一致性的因素，被认为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与生俱来令人无法抗拒的强制性。一个人一定会成为另一个人的亲属、另一个人的邻居、另一个人的同道信徒。因此，结果表明，不仅仅只是个人的情感、实际上的需求、共同的兴趣或者引起的责任，而且大部分是因为某些无法说明的绝对的意义（import），与归因于它自身良好的约束有重大关系。¹¹

族群认同是历史地产生的、能够自我保存并且毫不费力地自我激活，这样一种观点似乎影响了很多新闻工作者和学者对俄罗斯和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族群政治的评论。在一种常见的比喻（image）中，族群认同多年来被封存在共产主义的“冰柜”（deep freeze）中，它随着政治的解冻再次显现。¹² 第二种比喻（image）是“高压锅”，族群情感不仅被封存在共产主义的压抑下，而且一旦盖子被揭开，族群情感易于伴随着新的力量而爆发。¹³ 更诗意的表达是 Isaiah Berlin 的比喻，他说“一种受伤的民族精神……就象一条被弯曲的嫩枝，它被压迫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当它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它会伴随着暴怒而猛烈甩动”。¹⁴对于其余的学者来讲，族群认同准确地阐述了后共产主义政治的景象，这是因为过去的共产主义体制通过社会的建造、鼓吹和压抑等方式成

⁹ Gellner, “Nationalism in a Vacuum,” in Alexander J.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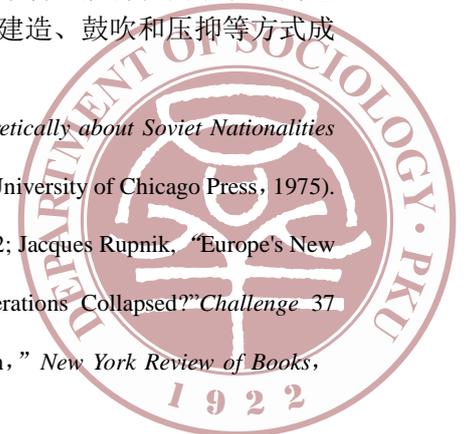
¹⁰ Geertz; Edward Shils, *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¹¹ Geertz (注释 1) 109-10.

¹² 参见 Timothy Garton Ash, *The Magic Lanter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142; Jacques Rupnik, “Europe's New Frontiers: Remapping Europe,” (Summer 1994) 95.

¹³ 关于“高压锅”理论，参见 Branko Milanovic, “Why Have Communist Federations Collapsed?” *Challenge* 37 (March-April 1994).

¹⁴ Nathan Gardels, “Two Concepts of Nationalism: An Interview with Isaiah Berl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2, 1991.



功地驱除了（demobilize）那些适应性较小的公民认同。¹⁵

但是，为什么族群行动主义从时间到空间呈现极大不同，上述族群原生论的观点只提供有限的解释。如果“血液、言语和习俗”（blood, speech and custom）的纽带导致了这样的行动主义，那为什么不同的族群带着大小不同的力量从高压锅里涌现出来呢？也就是，为什么鞑靼人应该比楚克奇人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呢，楚克奇人毕竟也有亲属关系、常用的语言和共享的习俗。

当试图去解释为什么族群认同在某些时间和地方要比在另外的时间和地方更强烈时，有人主张把这样的认同显著地与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¹⁶现代化导致了以前相互隔离的群体之间发生了互动，培养出一种感觉，使他们意识到彼此的不同。Rakowska-Harmstone 已经运用这个论点解释在发展时期各苏联共和国中民族主义在地下的生长。¹⁷然而，既然现代化的先在理论预言了它确实将战胜对立面，创造经济和职业的分化，取代传统文化的分化，那么这个论点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现代化特别地激活了群体认同的族群基础。¹⁸这里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可能性就是，在现代化早期，亲属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乡村文化类群（groupings）、前现代的宗教联系是已经存在的；在寻求现代化的物质利益的过程中，它们会很容易促成集体行动，这是因为使用已经存在的组织资本要比创造一个新组织（特别是经济组织）花费的代价要小，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¹⁹另一种可能性是，现代化将逐步削弱这些传统群体的领袖们的权威基础，他们就利用族群运动来反击这种威胁。²⁰

第三种可能性是，现代化所导致的经济或者职业分化（cleavage）与先在的族群边界刚好一致，并且加强了族群边界。发展不平衡的工业化可以避免地理上集中的族群，刺激在这些族群产生一种排外的“发展的”民族主义（a “developmental” nationalism of the excluded）。族群与其他边界相一致通常被认为是能够增强族群认同和族群组织，这不仅仅是在现代化的情形中。赫克特（Michael Hechter）预言更大的族群运动会发生在那些存在劳动力的文化分化的地方，其中的工作和生活机会被族群身份（ethnicity）所隔离。²¹ Melson 和 Wolpe 认为横切的差异没有出现是因为出现了共有的民族主义运动（associated the absence of crosscutting cleavage with the emergence of movements of communal nationalism）²²。Joseph Rothschild 认为“构造的族群内不平等”的存在是族群政治化的“丰富的土壤”。²³

然而，即使族群的分化和经济的分化紧密联系，是经济上处于有利地位的群体还是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更倾向于产生族群行动主义呢？这还是不清楚的。并没有证据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任何简单的联系。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在一项基于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族群运动的研究中，注意到在那些寻求分离的地方当中，富裕的地方数量要超过那些“资源贫乏和生产力低下”的地

¹⁵ George Schöpflin, “Postcommunism: The Problems of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Daedalus* 123(Summer 1994), 137.

¹⁶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Walker Connor, “The Politics of Ethnonation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uary 1973).

¹⁷ 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The Dialectics of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Problems of Communism* 23 (May-June 1974).

¹⁸ 关于第一种类型的论据的有关例子，参见 Deutsch（注释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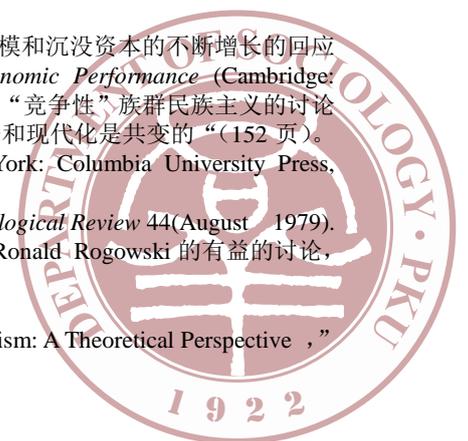
¹⁹ Douglass North 已经讨论了：尽管组织最初的目标已经被替代之后，对资本规模和沉没资本的不断增长的回应当然能够导致组织的保留；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这好像是隐藏在对于发展的非洲国家当中的“竞争性”族群民族主义的讨论中；例如，可以参见 Bates（注释 1），他写道：“在当代非洲，族群竞争的水平 and 现代化是共变的”（152 页）。还可以参见 Joseph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²⁰ Charles C Ragin, “Ethnic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Welsh Cas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August 1979). Rogowski 把这个称为“反应性”民族主义（“reactive” nationalism）；参见对 Ronald Rogowski 的有益的讨论，“Conclusion”，in Tiryakian and Rogowski（注释 3）。

²¹ Hechter（注释 1）。

²² Robert Melson and Howard Wolpe,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alis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December 1970), 1116.

²³ Rothschild（注释 18），2。



方。²⁴但是在发达西方国家和共产主义世界民族运动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刚好相反。Tedd Gurr 在研究活跃的政治派别群体时发现，最坚定的分离主义者群体是最贫穷的群体：“不管地方的繁荣、有限的自治、民族的重大政治影响是什么样的，西班牙巴斯克人、魁北克人、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都是分离主义者。”²⁵而在苏联，则是“那些有着最高的教育程度、最好的职业、通常还有政治地位的民族群体（nationalities），而不是那些处于劣势地位的边缘民族群体，推动最有野心的变化进程，从事最广泛的抗议。”²⁶

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还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分类，其分类的基础是两种相对位置：地区内少数民族群（minority ethnic group）的相对位置和国家内地区的相对位置。最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less developed）的那些教育、职业、经济“落后”的群体当中，也就是说，存在于害怕输给联邦州（in a united state）中更“先进”（advanced）群体的人群当中。²⁷这符合“发展的”（developmental）民族主义假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最弱的分离主义倾向性是存在于“落后”地区的“先进”群体，他们在整个联邦国家（within the larger state）中有更多的流动机会。同时，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群体和落后群体的分离倾向都位居中间水平。根据这个分类，霍洛维茨预言在苏联的那些经济落后的中亚国家中会有高比例的族群分离主义。²⁸

除了现代化的漫长历史进程，除了一致的经济边界（congruent economic cleavage）的存在，族群标志的一系列特定东西有时还可以被一些短期的、两极分化的事件政治化。²⁹有关边界的冲突事件可以唤醒先前潜在的族群认同，并且压倒经济的或者其他分歧（division）。³⁰1990 至 1991 年间前南斯拉夫战争冲突中的极端分裂和族群认同的复苏，也是一个例子。和族群诉求结合在一起的恐怖主义行动也能够引起一种不安全感，导致族群“用栅栏来防御”（stockading）³¹。一些事件可以使族群共同体遭受精神的创伤，激发起长期的族群怀疑和族群意识。在俄罗斯，那些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被斯大林残忍地驱逐出家乡的群体可能已经被遗弃，但他们有被强化的共享的民族认同（with a heightened sense of shared national identity）。

这些族群认同性质和强度的不同理论提供了俄罗斯和其他族群异质性国家（heterogeneous states）中地方领导人的分离行动主义的一系列假设。首先，原生论的理论可能暗示那些在文化上和主要民族群体（central nationality）差异最大的群体会有最强烈的分离主义领导人。这种文化上的疏离可以体现在语言使用的比例和宗教等方面。³²它也可能意味着领导人的分离行动主义将会随着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整个地区总人口的集中程度而发生变化。能够通过将族群标志政治化而被动员起来的联合体（coalition）越大和越强有力，政治企业家围绕着分离主义行动而进行活动的可能性越大。³³

现代化视角的不同看法提议的假设是：分离行动主义在下列情况中会更突出（1）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2）在最近迅速现代化的地方，（3）在为现代化的好处而进行斗争的**相对先进**群体中，

²⁴ Horowitz（注释 1）233.

²⁵ Gurr（注释 4）82.

²⁶ Philip G. Roeder,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43 (January 1991), 197; Kisangani N. Emize and Vicki L. Hesli, “The Disposition to Secede: An Analysis of the Soviet Cas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7, No. 4 (1995).

²⁷ Horowitz（注释 1）。这里使用的形容词“先进”和“落后”并没有暗含任何褒义和贬义的意思，它们仅仅是被选择用来说明使用这些术语的文献。

²⁸ Donald L. Horowitz, “How to Begin Thinking Comparatively about Soviet Ethnic Problems,” in Motyl（注释 8）9-22, 特别是 16-17.

²⁹ Banton（注释 2），14.

³⁰ Barry R. Pose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35 (Spring 1993).

³¹ Richard Jay, “Nationalism, Federalism and Ireland,” in Murray Forsyth, ed., *Federalism and Nationalism*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³² 例如，在俄罗斯，为了自治的目的，穆斯林民族群体（nationalities）、佛教民族群体、那些使用本族语的人口比例较高的民族群体可能要比正统基督教徒群体、语言同化程度较高的民族群体更快地被动员起来。

³³ 比较 Horowitz（注释 1），267：“分离主义的强度和地区异质性是反向相关的。”Emizet 和 Hesli 发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苏维埃共和国，如下情况是真实的：民族群体在自己共和国的聚居程度是“分离倾向的很有效的指数。”；Emizet 和 Hesli（注释 26），530.



(4) 在落后地区的落后群体中，这些群体在现代化的国家中因为没有能力参与竞争而受到威胁。趋同的差异 (convergent-cleavages) 这种观点意味着最强烈的分离行动主义将是在族群身份和职业或经济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最后，冲突具有动员性的视角意味着分离行动主义在下列地方可能最剧烈：在那些最近发生了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之间暴力冲突的地方；在迁入的居民威胁了传统认同的地方；或者在压抑的痛苦难忘的事件仍然还保留在现存记忆中的地方，这催化族群不信任。

动员

第二种理论认为，族群标志一直是存在的，一些地方领袖做出分离行动主义的原因在于是否有一定的组织出现，这种组织会围绕着族群标志动员个人参与集体行动。³⁴甚至，通过占有人口中的较大比例而形成的强烈的自我认同并不一定减少“搭便车”的问题 (Even intense self-identification by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will not necessarily mitigate the free-rider problem.)。群体是否被动员也决定于政治创业家 (political entrepreneur) 拥有资源的程度，使他们能够向群体成员提供激励和并监督回报情况。这种看法提供了一个假设：分离行动主义在族群组织存在并且对当地领导人施加政治压力的地方将是最大的。

讨价还价的能力 (bargaining power)

有可能导致地方分离行动主义的第三种观点，关注的是地方的独立性以及其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中央的领导既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地方想要更多自治权的要求。如果中央选择拒绝，那中央回应的方式有可能是妥协也可能是制裁。由于中央对所有的地区都是一样的，那么中央对各个地方的不同回应就反映出在特定情况下各个地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差异程度。

不同地区讨价还价能力存在差异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它们在控制讨价还价的制度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现代化的开始阶段，俄罗斯的各个族群地区要么是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要么是自治区。这些共和国直接隶属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那些隶属于所在地方的自治州和自治区相比，它们在中央有更多的权利和更多的代表。制造忠于政党的本地精英的政策，在共和国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在其他地方起更大，这些政策丰富了现任共和国领导人的经验，使他们有了更高的管理水平和更多的与中央讨价还价的制度资源。³⁵因此可以假定，由于拥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富于技巧的共和国领导人，“共和国”比那些制度上有较低地位的“地区”更有可能提出分离主义的要求。

关于讨价还价能力因素的第二个方面是博弈的报偿，而不是博弈的结构。善于工具性算计的地方领导人 (an instrumentally calculating regional leaders) 从一开始就从事分离主义活动的可能原因有两个。首先，一个领导人这样做实际上是将它作为获得不断独立的策略的一部分。如果这是事实，有可能有如下两种情况：要么该地区必须相信即便是中央给予了相应的制裁，它们也能从更大的独立中得到最终的利益；要么中央关于制裁的威胁一定是不可信的。第二，即使不渴望更大的独立，地区领导人也可能从事分离主义行动，这是希望能够用这样的威胁来从中央敲诈得到其他的让步。如果这是事实，中央制裁的威胁就一定是不可信的，并且中央一定比地区对于未达成协议而导致的代价更敏感。³⁶对中央而言，要地方摊牌比给地方好处的代价更昂贵 (to call the

³⁴ 我并没有想要表明在文化认同的意识和集体行动的组织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文化标志经常是围绕着组织形式的，而组织形式是由那些试图为了集体行动来动员群体的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参见 Paul Bras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North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27; E. J.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然而，不同的学者在标志和动员二者之间做了相似的区分。例如，Subrata Mitra 区分了定义文化民族主义运动所必要的“社会锚” (social anchors) 和围绕着“社会锚”的运动的动员；参见 Mitra, “The Rational Polit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Subnational Movement of South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January 1995), 64. 并且 Rothschild 认为政治企业家动员族群从“心理的或者文化的或者社会的状态”进入到“以改变或者巩固为目标的政治手段……不同族群类别之间的结构化了的的不平等系统”，参见 Rothschild (注释 18) p.2.

³⁵ Roeder (注释 25) p.228.

³⁶ 中央的“内部选择” (inside option) 可能要比地方的“内部选择”更缺乏吸引力。参见 Jon Elster, *The Cement of Society: A Study of Soci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76.

region's bluff than to pay it off)。

从自治中获得的预期利益越大，地区领导人追求风险的倾向愈大，那么一个地方进行分离主义行动的可能性也越大。同样的，中央对一个特定地区通过制裁而进行惩罚的能力越小，或者中央制裁地区的成本越大，地区就越有可能对中央施加压力。从独立中获得的预期利益有多种，其中经济方面的可能是最容易测量的。可以设想，那些对其他地区贡献很大的地区或者那些为其他地区提供宝贵资源的地区，可能预期从分离中获得正面的收益。地区对中央在通讯、贸易、原材料、补贴等方面的依赖性越大，当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时就越脆弱。中央对地方产品的依赖性越大，中央对地方进行制裁的成本越高。就国家解体风险而言，如果那些足够大到能够降低模仿风险的地区宣布分离，这些地区就能够立刻把解体风险的代价施加给中央。³⁷

领导人的特点

最后，即使对于族群地区整体而言，一定的分离行动主义预期能够带来有利的纯收益，但是否真正实行分离行动主义，还依赖于领导人自己特定的制度资源、利益和自我认同。那些在与中央的良好关系上进行投资并获得了政治资本的领导人（例如，国家政党的成员 member of national party），可能不愿意去冒失去或者降低这种政治资本的风险。那些在个人上与中央的制度有更紧密联系的地区领导人（例如，作为国家议会的当选的代理人），寻求破裂的可能性更小。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在中央已经失去制度支持的地区领导人，可能会通过新的“重新发现”的当地族群认同来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在苏联和俄罗斯，分析家们在渴望抓紧权力的那些地区的前领导人中发现了一个“权贵（nomenklatura）民族主义”的烙印。³⁸ 一些人嘲弄地谈到新的汉特人和曼西人的民族主义者们“有着俄罗斯人或者乌克兰人的脸”。那些有相当政治资本的地区领导人在地方组织中投入很多（例如，一个土生土长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会把与中央的对抗看成是一种动员潜在支持者的方式，从而增加他们筹码（stake）的价值。同时，在他自己的组织中，潜在对手的存在会限制他的策略的活动空间。

在俄罗斯，地方管理者挑战叶利钦的可能性，一个影响因素也许是他们在什么程度上需要把自己的工作成绩归功于叶利钦总统的支持。所有的族群地区通过当地立法机关选举出来最高苏维埃主席——因此，这代表了中央的共产党（central communist party）和当地精英的选择。在所有的共和国当中有 11 个共和国在 1991 年至 1993 年间举行了选举，总统或者行政长官是通过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自治州和自治区的行政首脑由叶利钦任命，他们有时是从一个地方苏维埃所提供的的不长的候选者名单中产生。可以预期那些由叶利钦任命的领导人所领导的族群地区要比那些由当地选举的总统领导所领导的地区更不会断言要实行分离主义。

三、测量俄罗斯的分離行动主义 (sepatatist activism)

在俄罗斯由族群定义的行政单位中 (Among Russian's ethnically defined administrative subunits)，其中的一些，例如车臣和鞑靼斯坦，人们已经对不断重复的独立要求、民族差异的宣称、拒绝莫斯科统治等等观念产生了认同。另外一些，例如楚克奇或莫尔多瓦共和国，几乎完全避免这样的对抗。本文的这一部分探寻对族群地区分离行动主义的差异程度进行系统测量的方法。

这项任务是复杂的，这是因为地方领导人提出的要求、主张和声明 (demands, assertions, and declarations) 类型多样，范围很广。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俄罗斯的地方领导人就已经显示出非凡的聪明才智，创建了一系列的施压策略。在更极端的方法中，他们用一般性的罢工、恐怖袭击、当地政府的突发事件、当地政府的关税和联邦政府财产的征用等方法进行威胁；他们甚至偶尔起诉中央政府，以便试图获得额外的更多让步。

³⁷ 这里有一种暂时的不对称性，使得那些不是真正想独立的地区和那些并没有可信的行动来对中央进行威胁的领导人，仅仅通过宣称独立这种方式迫使中央的让步——由于这仅仅是宣称，如果没有被否定或者没有受到惩罚，对于模仿者来说就会降低感知到的风险。

³⁸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Roudedge, 1993).

一些学者强调指出这些多变的行动下潜藏着表面上的分离目的。当一些地区领导人表现出努力争取从莫斯科的管理中获得真的独立，另外一些地区领导人则在进行投机和算计，争取从中央获得经济或政治上的让步。一些理论家已经主张，在已经存在的国家（state）中，要在寻求脱离和寻求更多利益这二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尽管这有时候可能通过有策略地威胁要脱离而实现）。³⁹然而，历史提供了很多依赖于国家协商和当前前景的范例：以故意误导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要求，为了策略性原因而降低需求的群体，⁴⁰在自治和独立之间来回摇摆的要求等等。在谈判的过程中，不可谈判的经常变得能够谈判，反之亦然。⁴¹因此，通过他们声称的目标对运动进行分类变得复杂，这是因为目标的策略性和弹性，也是因为实际上领导人的通常愿望被削减后也勉强接受了（by the frequent willingness of leaders in practice to settle for less）。⁴²根据他们所使用的策略，表面上的经济运动也不能从表面上的政治运动中区分出来。以经济目标开始的罢工经常变成政治性的。并且，正如地方领导人认识到的，纯粹以经济为目标的行动能够带来深远的政治结果，有时削弱了中央的权威而达到了革命和崩溃的程度。

因此这篇文章的方法就是去研究行动而不是目标，把各种行动看做潜在的变量（an underlying variable）——分离行动主义的标志。⁴³ 根据许多学者以前的工作，分离行动主义有很多标志。⁴⁴ 表 1 显示了根据特为本文所选的那些标志而将俄罗斯各族群地区依次排列的情况。

³⁹ Hudson Meadwell, “Transitions to Independence and Ethnic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in William J. Booth, Patrick James, and Hudson Meadwell, eds., *Politics and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1-92; Michael Hechter, “The Dynamics of Secession,” *Acta Sociologica* 35 (Winter 1992), 267.

⁴⁰ Horowitz 提供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例子，他们要求自治，而不是要求部分地独立，这样就避免了引起伊朗政权的敌对，从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得到了伊朗的支持；参见 Horowitz（注释 1），231-32。

⁴¹ Donald Rothchild, “Collective Demands for Improved Distributions,” in Rothchild and Olorunsola（注释 1）174.

⁴² 参见 Horowitz（注释 1），232。

⁴³ 另有一项研究根据宣称目标的连续统（continuum）对次要的运动进行了分类，见 Stein Pstokkan and Derek Urwin, *Economy, Territory,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3), 140-41。

⁴⁴ Emizet and Hesli Mark（注释 2）505-8; Mark Whitehouse, “Ethnic Compet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Russian Republics”（文章出现在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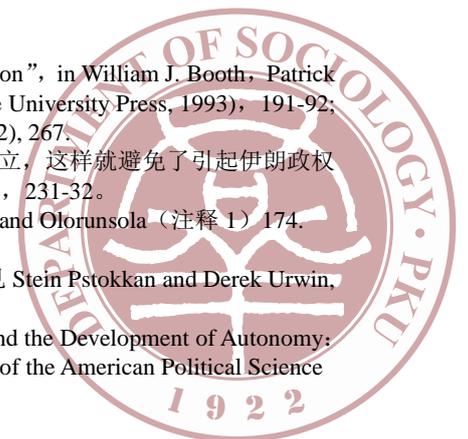


表 1 俄罗斯族群地区的分离行动主义 (separatist activism) 指标^a

	宣布自治 (sovereignty)	提高行政地位	采用自己的宪法	宣称法律至上 (legal supremacy)	举行独立公投	参加 1993 年 12 月联邦选举的投票人不到 25%	宣布独立 (independence)	拒绝输送士兵 (conscripts)	独立的外交政策	宣称对自然资源的权力	宣称有权发行货币	总的政治法律指标 (indicator)	总的经济指标 (indicator)	总指数(分离行动主义指数) index of separatist activism
卡累利阿共和国	X ^b		X ^q						X ^y	X ^y	X ^s	3	2	5
科米共和国	X ^b	X ^b	X ^q	X ^l						X ^{aa}		4	1	5
涅涅茨自治区	X ^c	X ^l										2	0	2
马里埃尔共和国	X ^b	X ^b								X ^z		2	1	3
莫尔多瓦共和国	X ^d	X ^l										2	0	2
楚瓦什共和国	X ^b	X ^b	X ^q	?						X ^q		3?	1	4?
卡尔梅克共和国	X ^b	X ^b	X ^q	X ^s						X ^q		4	1	5
鞑靼斯坦共和国	X ^b	X ^b	X ^q	X ^s	X ^v	X ^s	X ^v	X ^s	X ^v	X ^q	X ^s	9	2	11
阿迪格共和国	X ^b	X ^m										2	0	2
达基斯坦共和国	X ^e		X ^q							X ^q		2	1	3
卡尔巴尔—巴尔卡尔共和国	X ^f		X ^q	X ^u						X ^q		3	1	4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	X ^g	X ⁿ										2	0	2
北奥赛梯共和国	X ^h	X ^l	X ^r									3	0	3
车臣共和国	X ⁱ	X ^l	X ^s	X ^s		X ^s	X ^v	X ^s	X ^y	X ^q	X ^s	8	2	10
印古什共和国	X ⁱ		X ^q	X ^s	X ^w							4	0	4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X ^b	X ^b	X ^q	X ^s	X ^x			X ^y	X ^x	X ^s		6	2	8
乌德穆尔特共和国	X ^b	X ^b	X ^t									3	0	3
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	X ^b	X ^b										2	0	2
戈尔诺-阿尔泰共和国?	X ^b	X ^b										2	0	2
汉特-曼西自治区		X ^o										1	0	1
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	X ^j	X ^b										2	0	2
布里亚特共和国	X ^b	X ^b	X ^q	X ^s				X ^y	X ^q			5	1	6
图瓦共和国			X ^q	X ^s					X ^q			2	1	3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X ^p										1	0	1
泰梅尔自治区	X ^k	?										1?	0	1?
埃文基自治区												0	0	0
乌斯季-奥尔达自治区												0	0	0
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												0	0	0
萨哈共和国	X ^b	X ^b	X ^q	X ^s				X ^z	X ^q	X ^s		5	2	7
犹太自治州?												0	0	0
科里亚克自治区	X ^b	X ^b										2	0	2
楚克奇自治区	X ^b	X ^b										2	0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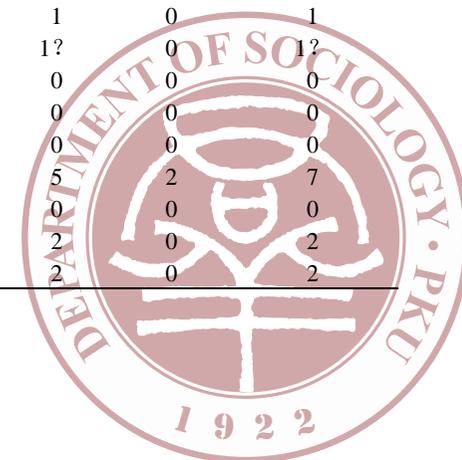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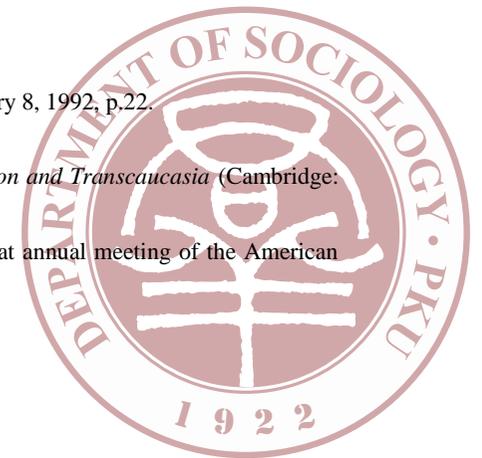


表 1 (注释)

- ^a X 指的是族群地区符合该情况。? 指的是不充分的信息。
- ^b Anne Sheetly, “Fact Sheet of Sovereignty”, *Radio Liberty Report on the USSR*, November 9, 1990, pp. 23-25.
- ^c *RL Report on the USSR*, November 23, 1990, p.35.
- ^d *RL Report on the USSR*, December 21, 1990, p.28。(打折扣的自治宣称, 是因为没有要求国家合法地位的“自治”这个词出现)。
- ^e *RL Report on the USSR*, May 24, 1991, p.38.
- ^f Ali Kazakhanov, “A Step toward Sovereignty”, *Izvestia* February 1, 1991, p.2.
- ^g *RL Report on the USSR*, November 30, 1990, p.22.
- ^h *RL Report on the USSR*, January 4, 1991, p.65.
- ⁱ *RL Report on the USSR*, December 7, 1990, pp.23-24.
- ^j Yuri Perepletkin, “Yet Another Republic”, *Izvestia* October 17, p.2.
- ^k Yelena Matveyeva, “The Provinces: Farce of Sovereignities”, *Moskovskie Novosti*, May 30, trans. in CDPSP, June 23,1993,45,no.21,p.18。
- ^l A.Ganelin, A. Kurushin, and A.Mursaliyev, “Abstract of Report of Sovereignty Declarations”, *Komsomolskaya Pravda*, May 18,1991, trans, in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June 3, 1991.
- ^m Jane Ormrod “North Caucasus: Fragmentation or Federation?” in Ira Bremmer and Ray Taras, *N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ⁿ Yuri Kalmykov, “Opposition: The Rights of the Karachai-Cherkess Autonomous Republic Are Being Violated,” *Izvestia*, July 4,1991.p.4, trans. in CDSP August 7, 1991,43, no.27,p.22.
- ^o Bogdan Szajkowski, *Encyclopedia of Conflicts, Disputes and Flashpoints in Eastern Europe, Russia and the Successor States* (London: Longman,1993),174.
- ^p A. Tarasov, “Khakassia: A People under the Sky ,but No Place on Earth,” *Izvestia*, December 20,1991,p.3, trans. in CDSP 13, no.51(1991),26.
- ^q Yelena Tregubova, “Nationalities Ministry Conducts Review of Regional Constitutions”, *Segodnya*, October 21, 1994, p.2, trans. in CDPSP 46, No 42 (1994).
- ^r Valery Shanayev, “North Ossetia Adopts New Constitution, Restores Old Name,” TASS, November 12, 1994.
- ^s Jessica Eve Stern, “Moscow Meltdown: Can Russia Surviv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Spring 1994).
- ^t Interfax, “Udmurtia Adopts New Constitution”, December,1994.
- ^u TASS, “Kabardino-Balkaria Wants Sovereignty, not Autonomy,” January 31, 1991.
- ^v Elizabeth Teague, “Russia and Tatarstan Sign Power-Sharing Treaty”, *RFE/RL Research Report*, 3, 14, April 8, 1994, pp.19-27.
- ^w Ali Khazanov, “News Hotline: 92.5% Cast Their Votes for a Sovereign Ingushetia,” *Izvestia*, December 4 1991, p.2, trans. in CDSP 43, No 49, January 8, 1992, p.22.
- ^x Radik Batyrshin, “Yeltsin and Rakhimov Reach an Agreement,” *Nwzavisimaya Gazeta*, August 4, 1994, p.1 trans. in CDPSP 46, no. 31(1994).
- ^y Strengthen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roject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Report on Ethnic Conflict in the Russia Federation and Transcaucasia* (Cambridg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uly 1993).
- ^z Mark Whitehouse, “Ethnic Compet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ree Russian Republics”(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September 1995).
- ^{aa} Georgii Vachnadze, *Goryachie Tockki Rossii* (Moscow: Kniga, 1993).



我将 1990 年至 1994 年间的 9 个政治-法律分离主义标志包括在其中，如下：

- 1、族群地区的政治领导人 (leadership) 宣布自治¹
- 2、领导人单方面宣称地方具有更高的行政地位 (例如，一个自治州宣称具有共和国的地位，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宣称具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位 (an ASSR asserting the status of an SSR))²
- 3、族群地区采用自己的宪法 (constitution)
- 4、运用宪法或者其他一些法律文件宣布，地方的法律或宪法优先于联邦的法律或宪法
- 5、就地方独立问题在当地举行公民投票
- 6、对 1993 年 12 月举行的联邦选举进行地方上的联合抵制，导致投票人不到 25%
- 7、不但宣称自治而且彻底独立，或者正式宣布本地区不再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 8、地方领导人拒绝再输送士兵到联邦军队的其他地方服务
- 9、宣称有权利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或者对外经济政策。

接下来，经济需求的两个指标包括：(1) 政治领导人宣称有控制自然资源的地方权力；并且 (2) 宣布有意向发行地方货币。对于某一特定的族群地区，将其明确 (positive) 的指标汇总，就产生了一个地方分离行动主义指数 (index of regional separatist activism)。

关于这些各种各样问题的数据是从非常广泛的资料中搜集来的 (参见表 1 的注释)，包括俄罗斯和西方的报纸、电视、广播，还有西方和俄罗斯地方专家的研究著作。此外，为了获得每一个地区的更多信息，还搜索了 Nexis 数据库。由于没有方法确定所有的信息是绝对完整的，因此尽力去调查了所有可以获得的资料。然而，可以获得的信息是如此的稀少和含糊不清，以至于有两个问题上很难做出可信的判断：楚瓦什官方是否宣布楚瓦什法律比联邦法律具有更高的效力，泰米尔自治区是否单方面地提升了其行政地位。因此这两个问题在表格中用问号标识出来。用一个点对这两个地区设置指数不会显著地影响结果。

对密切关注俄罗斯民族政治 (Russia's nationality politics) 的观察者来讲，这个表格的结果一点也不出人意料。分离主义尺度的最高值是鞑靼斯坦和车臣这两个共和国，分别是 11 分和 10 分。其后紧跟着第二等级分离主义的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和萨哈，分别是 8 分和 7 分。然后是一些分离主义分值居中的共和国——布里亚特、卡累利阿、科米和卡尔梅克，得分是 5 分或者 6 分。第二类共和国——印古什、马里埃尔、楚瓦什、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达吉斯坦、北奥塞梯、图瓦、乌德穆尔特——是较落后的激进分子 (slightly less activist)，得分是 3 或 4。莫尔多瓦共和国落在最后，落到了自治州和自治地区当中，得分在 0 到 2 之间。

有趣的是，各地区宣布政治权利的倾向和要求经济自治的倾向之间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背离。政治-法律指数的排序和更狭义的经济排序这二者始终是相当一致。这导致需要考虑一个富有意义的分离行动主义的复合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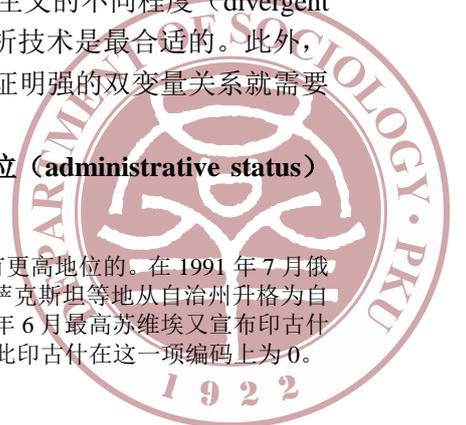
四、解释分离行动主义

在第二部分讨论的哪一个理论能够解释俄罗斯族群地区分离行动主义的不同程度 (divergent rates) 呢？既然假定各种因素是累计起作用的，那么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技术是最合适的。此外，因为对于假定的原因变量个数来讲，个案的数量有些少了，所以为了证明强的双变量关系就需要首先分析相关系数和交互分类表。

有一个因素是如此明显以至于需要单独分析：一个地方的行政地位 (administrative status)

¹ 既包括地区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包括总统。

² 这里只包括了如下的族群地区：族群地区官方是通过一份报告来单方面宣布具有更高地位的。在 1991 年 7 月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正式批准了阿迪格、戈尔诺-阿尔泰、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哈萨克斯坦等地从自治州升格为自治共和国。但是，上述地方中的每一个都已经单方面宣布了这样的变化。1992 年 6 月最高苏维埃又宣布印古什成为共和国；但是由于我没有找到官方对于印古什共和国地位的宣布记录，因此印古什在这一项编码上为 0。



几乎总是和它的行动主义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参见表 1）。自治区和自治州的分离主义程度（separatist）要比共和国的小，这几乎没有例外。实际上正如表 2 所显示，仅仅除了莫尔多瓦的伏尔加共和国这个例外，那些 1990 年有着共和国地位的族群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值等于或者高于中位数，而那些自治区和自治州的分离主义分值低于中位数。总体上来看，当自治区和自治州（Aos）限制他们自己宣布自治并且有时宣称更高行政地位的时候，共和国则进一步要求或者宣称更多的特权。

表 2 行政地位与分离行动主义（1990）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	<中位数（中位数=3）	≥中位数（中位数=3）
1990 年的共和国	莫尔多瓦	卡累利阿、巴什科尔托斯坦、楚瓦什、图瓦、马里埃尔、卡尔梅克、萨哈、达吉斯坦、鞑靼斯坦、北奥塞梯、布里亚特、乌德穆尔特、车臣、印古什、科米、卡巴尔达-巴尔卡尔
1990 年的自治州或自治区	涅涅茨自治区、阿迪格、阿尔泰、卡拉恰伊-切尔克斯、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汉特-曼西自治区、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哈萨克斯坦、泰梅尔自治区、埃文基自治区、乌斯季-奥尔达自治区、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犹太自治州科里亚克自治区、楚克奇自治区	

初步证据强有力地表明：各个地区在俄罗斯宪法结构中的地位影响了它的分离主义倾向。¹我已经假定情况属实，因为更高的行政地位赋予了一个地区在政府间的谈判机制当中能够有更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考虑到这种强关系可能会扭曲其他关系，我使用如下步骤来对双变量关系的其

¹ 如果原生族群因素自我决定了一个族群地区的管理地位，那么这个结论也可能被削弱。可获得的二手资料没有具体揭示这样的行政地位差别是如何出现的。但是，确实知道 1990 年“族群复兴”开始的时候，多数已经存在的行政地位差别基本上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早期的后革命政权年代就已经固定下来了。1936 年时的族群地区中有 15 个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5 个是自治州，其他的是自治区；参见 Viktor Kozlov, *The People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Hutchinson, 1988), 33。1990 年时的族群地区中，同样的 15 个还是共和国，同样的 5 个还是自治州。在这其中只有一个改变了类型，就是图瓦，它直到 1944 年还是莫斯科监护下的一个独立国家（state），1944 年之后作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入到俄罗斯（在作为自治州一段时期之后）。因此，解释行政地位的是原生性因素还是其他因素，就 20 世纪 20 年代或者 30 年代来说，可以说它是原生性因素（it was primordial factors as of the 1920s or 1930s）。

然而，在这些年里很多原生性因素已经改变。例如，1937 至 1989 年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奥塞梯人口几乎翻倍，卡累利阿的人口降低了 46%，参见 Channcy D.Harris “A Geographic Analysis of Non-Russian Minorities in Russia and Its Ethnic Homelands”, *Post-Soviet Geography* 34, no.9(1993)。移民已经剧烈地改变了不同民族群体（various nationalities）在自己祖国（homeland）中的集中程度。当一些族群人口还部分保留了他们的民族语言（national language）时（1989 年时，98 或 99% 的图瓦人、卡拉柴人、Kabards、车臣人、印古什人和达基斯坦的很多民族群体报告说族群语言是他们的母语），其他的一些族群已经在语言上被俄罗斯语同化了（1989 年时只有 49% 卡累利阿人认为卡累利阿语是他们的母语，小于自治区中很多民族群体的同一百分比）。

在早期后革命（postrevolution）年代，行政地位的决定是被高度集中的。因此，“在每一个案例中，自治是通过中央权威的单边决定来实现的”；参见 E.H.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1*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329。一些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对于这样的地位似乎有强烈的原生要求，但是另外一些则没有。关于西伯利亚，Carr 写道，“原始的本地部落（primitive native tribes），……散布在广袤的、人烟稀少的土地上”，“没有事实上的民族主义或者分离主义运动”（350 页）。不过，布里亚特-蒙古（Buryat-Mongolia）在 1923 年时成了自治共和国，并且广大的雅库特（Yakut）地区在 1922 年也获得承认，成为自治共和国。

接下来，将行政地位的影响从其他因素的可能影响中剥离出来的统计分析表明，行政地位在本质上是最能够解释行动主义的变量。共和国在理论上更倾向于分离主义，这是因为它们有更多更密集的人口、更集中的名义（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the titular）——或者更明白地说就是非俄罗斯族（more broadly of non-Russian）——民族群体（nationalities）、规模更大的本族语的学校教育、更工业化的经济、或者更组织化的分离运动。检验行政地位变量是否制造了虚假相关的一个方法就是：加上其他潜在的解释因素，在行政地位上对分离行动主义指数进行回归分析，观察行政地位变量的估计系数是否变化。当我这样做的时候，行政地位变量在所有的情况中都显著，并且估计系数（estimated coefficient）（当没有控制变量包括进来的时候是 3.9）在大多数分析中变化很小，并且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控制地区人口）只跌到了 2.4。这样看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行政地位本身这个因素，独立于原生的或者其他因素，在决定族群地区领导人的分离行动主义中起重要作用。

他假设进行检验：不仅在所有族群地区当中，而且也在 1990 年的 16 个共和国当中检视存在的这种关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些与经济或者文化因素相关的很明显的联系，实际上能够被不同的行政地位所清楚地解释。

在决定哪一个俄罗斯族群地区上演积极的分离主义运动时，**原生性族群 (primordial ethnicity)** 好像不是决定性因素，除了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宗教认同，它可能和更广的文化差异联系在一起。传统上是穆斯林民族群体 (titular nationalities) 的共和国要比那些传统上是基督教、佛教、萨满教的共和国更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穆斯林地区的分离行动主义的均值是 5.5，而非穆斯林地区的是 2.5。¹ 甚至只看 1990 年时的各个共和国，穆斯林共和国的分离行动主义均值是 6.7，而相应的非穆斯林共和国是 4.2。² 三个最坚决的分离主义地区——鞑靼斯坦、车臣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是穆斯林地区 (参见表 3)。

表 3 穆斯林传统和分离行动主义 (包括共和国、自治区、自治州)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	0—2	3—4	5—6	7—8	9—11
穆斯林	2	3		1	2
非穆斯林	14	5	4	1	0

没有证据显示分离主义更有可能发生在那些对语言有更强烈的原生情感的地区和那些较大的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者社区当中。名义民族在本国中的聚居 (concentration of the titular nationality in its homeland) 和分离行动主义两者之间似乎存在联系，这一点完全可以通过如下事实来解释：对于名义民族群体的聚居程度，自治区和自治州(AOs)的要比共和国的更低。在 1990 年的共和国当中，名义民族群体的聚居和行动主义之间没有联系。行动主义和如下因素也无关：地区人口中非俄罗斯人所占的比例、1959—1989 年间名义民族群体人口的变化速度、1959—1989 年间名义民族群体在地区总人口中所占份额的变化、使用本族群语言的名义民族群体人口的比例、学习当地语言的在校生比例 (参见表 4)。这就留下了宗教作为唯一的原生性因素，它在动员族群群体给地方领导人施压去从中央那里要求更大自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表 4 分离行动主义和原生性族群变量 (相关系数)

	名义民族群体的比例	非俄罗斯人的比例	1959—89 名义民族群体的增长速度	1959—89 名义民族群体在地区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长	使用族群语言的人口比例	学习当地语言的在校生比例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所有的 32 个共和国和自治区、自治州)	0.45 (0.01)	0.39 (0.03)	0.30 (0.10)	0.30 (0.10)	0.29 (0.10)	0.14 (0.53)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1990 年的 16 个共和国)	-0.05 (0.86)	0.03 (0.92)	0.19 (0.47)	0.20 (0.44)	0.12 (0.66)	0.02 (0.93)

注：圆括号中是显著性水平，双边检验。

接着讨论下一个问题：俄罗斯各地区的分离行动主义程度是通过现代化的趋势，还是通过族群冲突，或者是通过劳动力文化分工导致族群认同政治化而形成的呢？证据显示在现代化和分离主义之间至多有微弱的联系 (参见表 5)。也没有观察到分离主义分值的高低和下列因素之间存在联系：地区的城市化、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农业劳动者在劳动力中的比例、1990 年的平均工资等等。然而，分离行动主义和名义民族群体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之间似乎有弱的正相关，³ 这还是可以通过如下因素来解释：自治区和自治州的人口有着特定的农村特点 (在 1990 年的共和国

¹ 在 0.01 的水平上，差别是显著的。

² 然而，这种差别只在 0.06 的水平上是显著的。

³ 由于数据限制，这里使用的数据是 1989 年时苏联的特定民族群体的城市化水平，而不是俄罗斯的。



中二者没有联系存在)。这里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前述那个最近迅速现代化的假设 (recent-rapid-modernization hypothesis)。工业资本强度在 1981 至 1990 年间迅速增加的地区可能也不再是分离主义的了。

表 5 分离行动主义与运动 (相关系数)

	地区人口 的城市化 比例	名义民族群 体在苏联农 村中的比例	中等教育 人口的比 例	高等教育 人口的比 例	1990 年的平 均工资	农业劳 动力的 比例	1981-90 年 工业资本强 度的变化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 (所有的个共和国 和自治区、自治州)	0.25 (0.18)	-0.36 (0.05)	-0.18 (0.33)	-0.06 (0.74)	0.25 (0.34)	n. a.	-0.17 (0.36)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 (1990 年的共和国)	0.11 (0.69)	-0.01 (0.97)	0.05 (0.86)	0.09 (0.73)	0.19 (0.52)	-0.18 (0.52)	-0.02 (0.94)

注：圆括号中是显著性水平，双边检验。

霍洛维茨认为现代化水平较低地区中的现代化水平较低的群体有最大的分离倾向。由于在比较民族群体和地区的时候，现代化指数并没有整齐地排序，所有检验这个假设是复杂的。苏联的民族政策遗留下了一些特殊群体：与那些更城市化、更工业化的俄罗斯人相比，他们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乡村、农业的群体。¹然而，那些能够进行的检验表明霍洛维茨的分析并不适合俄罗斯分离行动主义的模式。

图 1 显示了根据城市化水平、工业产出、农业就业等所划分的族群和地区。族群地区被分类成“先进的”或者“落后的”，这里并没有隐含意义、贬义或者其他意义，选择使用这小样的术语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和霍洛维茨最初的假设相一致。

图中给出了每一类的平均分离行动主义分值。霍洛维茨的理论预测最高的分离主义倾向在右下象限。族群劳动力分工的假设可能出现在民族人口的现代化比地区平均水平更低或者更高的条件下，大体上在右上象限和左下象限。实际上，最高分离主义均值是出现在这两个理论中都没有预测到的一类中——在先进地区的先进民族人口中。先进地区的先进民族 (advanced nationality in advanced region) 的平均分离主义分值比其他任何一类都高很多。²可能最重要的是，图 1 同一象限中的地区分离主义分值的变化幅度大，说明这种界定方法的解释力在俄罗斯较弱，并不象在非洲、亚洲，或者加勒比海那样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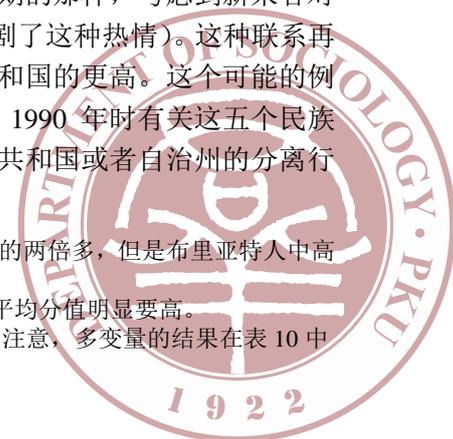
令人惊奇的是，对于先进民族和落后民族定义中的差别来讲，这个结论是相当稳健的。当用中等教育的水平或者城市化进行分类的时候，不同单元格中的族群地区的一致性有些许改变。但是在每一个具体个案中，先进地区的先进群体的平均分离主义分值至少比下一个较高类别高出 1 分。

双变量的分析不支持冲突假设，除了一个例外。谈判过程中发生族群暴力的地区，或者卷入到与邻居发生领土争端的地区，其分离主义分值都没有大大高于平均值。³在移入者的人口比例和分离行动主义之间出现了一种违反直觉的反向联系（正如可能被预期的那样，考虑到新来者对工作和当地资源的竞争，移入者似乎浇灭了分离主义的热情而不是加剧了这种热情）。这种联系再一次通过如下事实所解释：自治区和自治州的移入居民的比例要比共和国的更高。这个可能的例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斯大林驱逐的民族群体 (nationalities)。1990 年时有关这五个民族群体 (卡拉柴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 的共和国或者自治州的分离行

¹ 例如，根据 1990 年的人口普查，尽管布里亚特人的乡村人口是俄罗斯乡村人口的两倍多，但是布里亚特人中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比例要比俄罗斯的高 50%。

² “落后”地区的“先进”民族的平均分值也比“先进”地区的“落后”民族的平均分值明显要高。

³ 不管是否在所有的族群地区或者仅仅是在 1990 年的共和国，这种情况都属实。注意，多变量的结果在表 10 中呈现。



动主义平均分值为 5.0，与此相对照的是，不包括被驱逐群体的 17 个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平均分值为 3.9。然而，这种差异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因此，尽管宗教不同似乎已经扮演了一个动员的角色，但是其他的与族群分布或者激活族群标志代价有关的因素好像不能解释俄罗斯的地区分离主义经历。

族群组织动员的存在及其程度决定了哪些地区领导人将提出分离主义需求吗？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特定的数据问题，所以这里的结论只能是初步的。由于知道没有可靠的信息资源来估计在一个地区中族群组织的相对全体成员数量，因此我构建了一个指数来作为替代工具，这个指数就是那些有明确民族主义目标的地区组织的成立时间或者它们第一次在俄罗斯报刊上谈到分离主义的时间。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员程度的其他指数还有：民族主义运动是否形成了形成了有武装的民兵组织、是否已经产生了一个类似的以民族（nationality）为基础的议会机构。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在那些已经建立起以民族（nationality-based）为基础的议会机构并且民族主义组织已经出现的族群地区更可能出现活跃的分离主义。（参加表 6）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如下事实：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组织要比自治州和自治区的更大。然而，在所有的 32 个族群地区中，地区民族主义民兵组织的存在和分离行动主义绝对相关，并且几乎和 1990 年前的共和国中一样强烈。¹有民族民兵组织的 6 个地区的平均分离主义分值为 6.3，而 25 个没有民族民兵组织的族群地区的这一分值为 2.5。这表明在民族运动已经组织化并且非常激进的族群地区，民族主义组织会更有效把它们的要求强加给地区政治领导人，或者领导人可以把它们作为更可信的分裂威胁的借口并且用它们来和中央讨价还价。

表 6 分离行动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组织（相关系数）

	指数：民族主义组织的建立时间（或者可寻找到的第一次报道）（早出现的组织=低）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 （所有的共和国和自治区、自治州）	-0.57 (0.00)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 （1990 年的共和国）	-0.18 (0.50)

注：圆括号中是显著性水平，双边检验。

暂时不考虑地区选民的利益和需求等因素，可以预期，地区领导人的立场会被他们自己特定的既得利益、个人历史、社会网络所影响。然而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俄罗斯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个观点（参见表 7）。首先，那些过去曾经作为党组织成员在党内或者国际机构中工作过的地方领导人²与那些有其他工作经历的地方领导人相比，既不更多也不更少地提出分离主义要求。本身就是名义民族（titular nationality）的领导人表现出更小的可能性去从事分离主义行动，但是这反映的是这样的事实：与自治州和自治区的的领导人相比，共和国的领导人更多的是名义民族群体的成员。叶利钦任命的领导人更不可能成为分离主义者，而那些由当地民众选举出来的地区领导人更可能成为分离主义者。但是，这种效应大部分可以由以下事实解释：所有的选举都发生在共和国，而所有来自莫斯科的任命都是发生在自治州和自治区内。³ 单独就 1990 年的共和国而言，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略高的平均行动主义并不显著。总之，从更广的制度层面上的区分来看，在行政地位不同的族群地区当中，统计上没有显示出地方领导人的特定特征和既得利益对地方领导人的分离行动主义起到了作用。这里有一个族群地区是例外，其共和国领导人也是民族主义组织的领袖——车臣。车臣的分离主义分值大大高于其他地区的均值。

¹ 在这两种情况中，有民族主义民兵组织的族群地区的平均分离主义分值大大高于其他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值。

² 地方领导人是共和国的主席或者行政首脑，或者是自治区和自治州的行政首脑。当然，这简化了多数地区中更复杂的力量平衡。

³ 有一个例外，就是印古什的 General Aushev，他先是由叶利钦任命，然后被选举成总统（president）。



地 区

		先 进	落 后
民 族 人 口	先 进	鞑靼斯坦[11] 科米[5] 均值=8.0 均值（仅共和国）=8.0	北奥塞梯[3] 卡累利阿[5] 卡尔梅克[5]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4] 阿迪格[2] 莫尔多瓦[2] 均值=3.5 均值（仅共和国）=3.8
	落 后	哈萨克斯坦[1] 楚克奇自治区[2] 汉特-曼西自治区[1] 亚马尔-涅涅次自治区[2] 均值=1.5 均值（仅共和国）=n.a.	涅涅次自治区[2] 印古什[4] 马里埃尔[3] 图瓦[3] 泰梅尔自治区[1] 车臣[10] 楚瓦什[4] 布里亚特[6] 达基斯坦[3] 犹太自治州[0] 萨哈[7] 埃文基自治区[0] 科里亚克自治区[2] 乌德穆尔特[3] 巴什科尔托斯坦[8] 戈科诺-阿尔泰[2]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2] 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2] 乌斯季-奥尔达自治区[0] 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0] 均值=3.1 均值（仅共和国）=5.1

图 1 先进和落后地区中的先进和落后群体的分离行动主义

注：

1、方括号中给出了分离行动主义的分值。和 Horowitz 最初的假设相对应的“先进”和“落后”这两个词是中性的，并没有其他隐含意义、贬义或者其他意义。

被归入先进的地区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城市人口的比例高于俄罗斯所有地区的平均水平（67%），1993年的人均工业产值高于所有地区的平均水平（人均 805000 卢布）。被归入先进的民族人口（national population）具备以下条件：在 32 个名义民族群体中，城市化水平位于前 10 位，并且农业劳动力的人口比例位居后 10 位。

2、在有多个名义民族群体的地区，例如达基斯坦或者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城市化水平和农业劳动力比例是通过以各个名义民族群体的人口比例作为权重加权后的平均数。

表 7 分离行动主义和地方领导人的个人特征

	地方领导人在国家或者党组织中工作过	地方领导人在国家或者党组织中工作过	地方领导人是民族民族群体的成员	地方领导不是民族民族群体的成员	地方领导也是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	地方领导不是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	地方领导是叶利钦任命的	地方领导不是叶利钦任命的	地方领导是选举产生的	地方领导不是选举产生的
平均分离行动主义指数（所有的共和国、自治区、自治州）	3.1	3.7	3.9	2.1	10.0**	3.1**	1.3**	4.5**	5.1**	1.6**
平均分离行动主义指数（1990 年的共和国）	5.0	5.2	5.2	4.3	10.0*	4.8*	4.0	5.1	5.4	3.7

*均值的差异在 $p < 0.05$ 时显著。 **均值差异在 $p < 0.01$ 时显著。

最后，对地区独立和相对讨价换能力的关注如何影响了地区领导人的选择呢？有些人认为，独立只是地理上的结果。那些有国际边界的或者有功能性港口的地区，有更多的机会成功成为独立的国家或者抵制中央的经济制裁。由于周围边界是敌意的和封闭的，那些名义民族群体在俄罗斯其他地方有较高比例的地区很难独立。并且，那些临近莫斯科的地区要比那些离莫斯科很远的地区更容易受到中央的压力。然而实际上，没有证据支持这些假设中的任何一个。令人惊奇的是，与那些有国际边界或者那些有港口的地区相比，被俄罗斯领土所包围的族群地区并不会更少地采取针对中央的分离主义行动。¹不管是距离莫斯科的远近还是在其他地区中族群人口的相对数量，都没有导致分离行动主义的差别（参见表 8）。

表 8 分离行动主义和地理劣势（相关系数）

	与莫斯科的距离	在本地区之外的名义民族群体人数占总数的比例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所有的共和国、自治区、自治州）	n.a.	-0.28 (0.13)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1990 年的共和国）	0.11 (0.69)	0.11 (0.69)

注：圆括号中是显著性水平，双边检验。

讨价还价能力和独立的第二个方面关注的是财富、资源、地方面积大小，以及能够同时影响以下两方面的各种因素：各地区意识到作为独立实体的生存能力和谈判过程中承受中央压力并对莫斯科施加经济压力的能力（参见表 9），对此的证据是相当有力的。

表 9 分离行动主义和经济讨价还价能力（相关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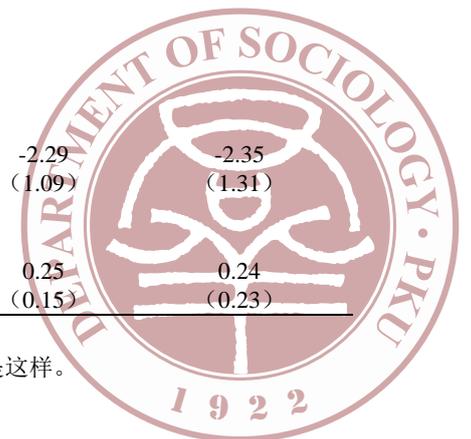
	人口	1993 年人均工业产值	1992 年中央补助在地方政府开支中的比例	1988 年工业人均出口额	在俄罗斯原材料总产值中所占百分比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所有的共和国和自治区、自治州）	0.73 (0.00)	0.06 (0.75)	-0.38 (0.04)	n.a.	0.61 (0.00)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1990 年的共和国）	0.61 (0.01)	0.58 (0.02)	-0.42 (0.11)	0.56 (0.02)	0.60 (0.02)

注：圆括号中是显著性水平，双边检验。

表 10 用假设的原因因素的各种子集对分离行动主义指数进行回归的回归系数

模 型	1	2	3	4（只有共和国）
1990 年时是共和国的地区	3.84 (2.22)	4.90*** (0.75)	4.21*** (0.90)	—
名义民族群体人口的比例	0.02 (0.02)			
名义民族群体主要是穆斯林	2.61 (2.37)	3.96*** (0.79)	3.24** (0.93)	3.66* (1.15)
使用族群语言的民族人口（national population）比例	0.00 (0.03)			
地区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例	-0.00 (0.05)			
民族人口（national population）中农村人口的比例	0.02 (0.04)			
最近发生的族群暴力事件	-2.99 (2.01)	-2.94** (0.98)	-2.29 (1.09)	-2.35 (1.31)
被斯大林驱除的民族群体（nationality）	-1.02 (1.97)			
民族主义组织出现的时间	0.30 (0.23)	0.32* (0.12)	0.25 (0.15)	0.24 (0.23)

¹ 不论是对所有的 32 个族群地区，或者仅仅是 1990 年的 16 个共和国，情况都是这样。



存在民族主义民兵组织	1.21 (1.80)			
选举产生的地区领导人	0.99 (1.21)			
政府或者议会的领导人是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	2.01 (2.19)	4.23** (1.23)	2.29 (1.83)	4.74* (1.91)
领导人是名义民族群体成员	0.41 (0.93)			
人口	0.00 (0.00)			
1993 年人均工业产值	-0.00 (0.00)			
中央补助在地方政府开支中所占比例	-0.04 (0.04)	-0.03* (0.01)	-0.02 (0.02)	-0.01 (0.03)
1993 年时在俄罗斯联邦原料产量中地方所占的份额			0.33 (0.20)	
1988 年人均工业出口额				0.26 (0.18)
常数	-2.37 (5.20)	-1.06 (1.17)	-0.74 (1.27)	2.70 (1.61)
R ²	0.858	0.817	0.802	0.806
调整的 R ²	0.631	0.771	0.696	0.660
个案量 (N)	26	30	20	14

*p<0.05 **P<0.01 ***P<0.001

与那些只会产生含糊结果的其他因素相比较，分离行动主义的程度与族群地区的经济前景、族群地区的讨价还价能力有很强的关系。人口多、工业产值高（主要是原材料产地）的族群地区，或者工业出口多的族群地区，分离主义更强烈。那些主要依赖中央补助来为地方政府开支提供资金的地区则趋向于更加谨慎。¹ 这表明，理性计算这种要素始终存在于俄罗斯各地区的分离行动主义当中。

尽管在识别各因素之间的强关系时，相关和均值比较是很有用的，但是它们没有在多变量背景中剥离出不同变量的分离效应。因此，恰当的方法是使用回归分析。表 10 显示了用假设的原因因素的各种子集对分离行动主义指数进行 OLS 回归分析的结果。

模型 1 描述了自变量包括多数假设原因变量时的系数估计值。由于个案数量很少，自变量又很多，估计值的显著性很低，这并不令人吃惊。模型 2 显示了一个简化的回归结果，其中我剔除了所有那些不能显著改进回归拟合的自变量（通过 0.10 显著性水平下 F 检验来判断）。由于缺乏数据，这意味着在回归模型中如果包括出口额或者原材料产量这两个变量将大大减少可用的个案数量，因此模型 1 和模型 2 中没有包括这两个变量。不过，模型 3 和模型 4 显示了包括这两个变量时的估计值情况。

双变量分析的主要结果都得到了确认。地区行政地位仍然保持了根本的重要性：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分值平均是 4 或 5，要高于非共和国的自治区和自治州。穆斯林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值平均 3 或者 4 分，要比非穆斯林地区更高（其他的原生性因素或者现代化因素仍然不显著）。依赖于中央补助的族群地区似乎有较小的分离主义倾向，但是一旦将原材料产量和出口量这两个因素包括进来后，这个结果就不再显著。² 尽管在给定的案例数目很少的情况下这个结果当然不显著，但是正的系数表明工业产品的原料生产地区和出口地区平均更具有分离主义更倾向。并且，在总统或议会主席也是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的两个地区——车臣和图瓦，即使控制了能够提高回归拟合的其他因素之后，也还是有更强烈的分离主义。

有两个结果更出人意料。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前四年中有族群暴力的地方采取分离主

¹ 然而，单独考虑 1990 年的共和国时，这种情况并不显著。

² 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当这些因素被加入后，可用个案数的迅速降低导致的。



义行动的倾向性较小。可能这是因为近期内族群冲突的经历提高了地方领导人对危险的警惕性，他们对激发族群紧张的危险相当敏感。并且，当其他条件一样时，某一地区内民族主义组织建立得越早，这一地区的分离主义就更微弱。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可能解释是：较晚组织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被中央前期对地方分离主义要求的妥协所激发出来，而那些最先提出自治要求的地方在他们的目标变得激进之前就被平息了。

最后，独立要求的决定因素异于更多自治需求的决定因素吗？如果因变量中结合了两个性质上不同的现象，这有可能歪曲结果；为了检验是否存在这种情况，我从数据中剔除了车臣和鞑靼斯坦这两个实际上已经宣布独立的共和国之后，进行了同样的回归。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和前面的分析是一样的。共和国这种地位仍然是最显著的因素，并且近期的政治暴力仍然和分离行动主义负相关。对中央补助的依赖也是一个抑制性因素，尽管不显著。虽然系数值有点低，但原料产出额和工业出口额的回归结果和表 10 中显示的结果差不多。最引人注意的不同是，在剔除鞑靼斯坦和车臣之后，穆斯林民族群体（Muslim nationality）变量就完全不再显著了。然而，族群地区中民族主义民兵组织的存在大大提高了预期的分离主义分值，正如族群领导人也是名义民族群体成员这种情况也显著提高了分离主义分值。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虽然穆斯林传统可以使地区领导人更可能寻求独立，但是在决定一位领导人如何独断地要求较低自治程度时，与组织化、有武装的民族主义者的压力相比，甚至与地方领导人的民族群体身份（the regional leader's nationality）相比，穆斯林传统的重要性都要更小一些。

五、结论

俄罗斯 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minority nationalisms）经历为各种分离行动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检验场地。这篇文章关注的是为什么俄罗斯 32 个以族群定义的地区，其中的一些（例如车臣和鞑靼斯坦）已经要求更大的独立，然而另一些（例如莫尔多瓦和楚克奇）实际上保持沉默。每一个分离主义群体有不同的历史和一整套的动机来要求更大的独立，比较分析显示出了一些清晰的模式。

首先，除了一个例外，支持民族主义者的行动主义高压锅理论（pressure-cooker theories of nationalist activism）的证据很少，高压锅理论认为中央控制的减弱释放了那些最聚居和自我意识最强的少数民族（most concentrated and self-conscious ethnic minorities）的受到压抑的原生性情感。实际上，分离行动主义并没有随着名义民族群体的聚居程度、族群语言的使用、或者族群语言的学校教育而变化。奇妙的是，16 个族群共和国在 1990 年宣布独立的时间先后所形成的“独立自主的队伍”（parade of sovereignties）是和该地区中俄罗斯人口的数量正相关（参见图 2）¹。名义民族群体的地区领导人比起那些俄罗斯族的地区领导人，并没有更大的可能性提出分离主义需求。一个显著的原生性特征是穆斯林宗教传统，它似乎容易引起更大的分离主义。正如建议的那样，一种尝试性的解释是：原生性情感解释地区领导人的策略，关键不在于族群意识的强度和关注程度，而在于文化认同的特定内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界限比其他的文化或者语言分歧更有影响力。

¹ 一位匿名的审稿人提出了一种有趣的解释：地区领导人在挑战和威胁中央的时候，如果他们有相当多的俄罗斯人，那么就能够以此作为人质，他们就会感到更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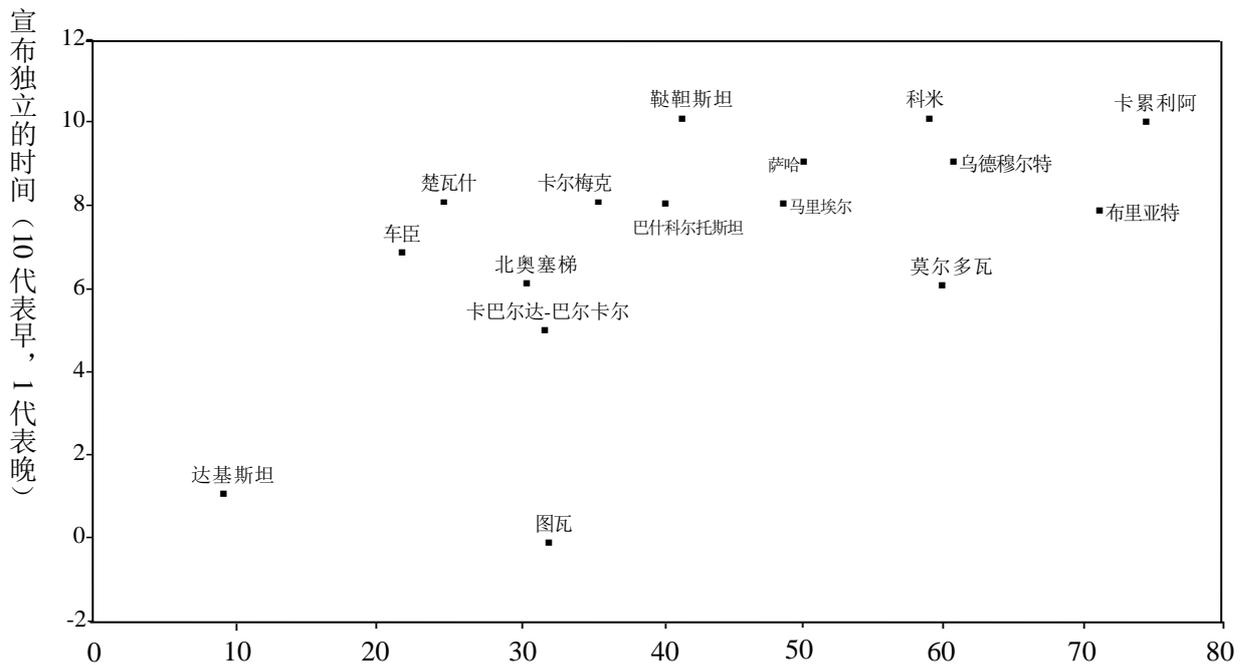


图 2 宣布独立的时间和俄罗斯人的比例 (16 个自治共和国)

以上这个结论不仅在统计分析中呈现出来，而且在比较俄罗斯的若干族群共和国的历史时，这个结论也很清晰。如果认为原生性的族群情感是关键，那么在图瓦这个佛教共和国中应该发现最坚定不移的分离主义者。（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图瓦在 1944 年并入苏联，1989 年时总人口中有 64% 的是图瓦人，其中有 99% 说母语图瓦语，并且公立学校的学生中有 60% 在图瓦语学校就读。到 1991 年，三个主要的政治领袖（主席、总理、立法会主席）是图瓦人。而且，族群认同被 1990 年图瓦人和俄罗斯人的暴力冲突所催化，在冲突中有 7 个俄罗斯人被杀害。¹

实际上，图瓦是 1990 年时分离主义最弱的族群共和国之一，它的温和顺从仅仅被莫尔多瓦所超过。有些族群地区的领导人采取了要比图瓦更强烈一些的分离主义行动，这样的族群地区都有一些相对弱小的原生性族群。在科米这个基督教化的共和国，不到四分之一的居民是科米人，并且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居民不再说他们的母语科米语，1993 年时所有的学校都是使用俄罗斯语。在卡累利阿，这里的名义民族（卡累利阿族）“正在迅速地被俄罗斯人同化”，1989 年时只有 5% 的共和国居民说卡累利阿语是他们的母语。² 然而在 1990 年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爆发过程中，科米和卡累利阿都是最先宣布独立，而图瓦则是很谨慎地没有参与其中。

在其他地方加强族群认同的因素——现代化、移民移入、冲突——对于俄罗斯的地区分离行动主义并没有影响。模型并没有表明那些由于现代化进程而处于劣势或者受到威胁的群体发展了或者再创造了民族主义。并不像 Horowitz 所研究的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的案例那样，最强烈的分离主义没有出现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较不发达的群体中。实际上相反的一面是正确的：如果在现代化和分离主义之间存在联系，那么应该是发达地区中的经济上和教育上处于优势的群体。与菲律宾的穆斯林或者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相比，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们和加泰隆人、巴斯克人有更多的一致性。预期的“劳动力的族群区隔”假设（“ethnic division of labor” hypothesis）也没有

¹ Toomas Alatalu, “Tuva: a State Reawakens,” *Soviet Studies* 44, No. 5 (1992) 890.

² Harris (注释 46), 584.



得到证实，名义民族群体的现代化水平和其他人口的现代化水平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导致更强烈的分离主义。并且，是族群冲突，而不是分化的社区的自治需求和聚居的少数民族的自治需求，告诫了地区领导人要注意危险的族群热情。

由于可以利用的数据有限，很难确定民族主义运动组织的不同情况会导致分离行动主义产生什么样的区别。然而，当控制其他因素时发现：民族主义组织出现得越早，分离行动主义的程度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在晚出现的组织化的民族主义群体要比那些在自由化(substantial liberalization)降低了风险之前出现的群体更加激进。当地区的总统、行政首脑或者议会主席也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时，正如在车臣和图瓦那样，分离行动主义似乎增长了。

一些始终持续不变的结果涉及到各地区在与中央博弈时的起点和讨价还价能力。具有共和国的行政地位或者近乎共和国的族群地区要比那些只是自治州和自治区的地区会更挑衅地对中央耍手腕，严重依赖中央补助的族群地区会相当理智地采用一种更温顺的姿态，那些能够出口潜在和有价值的自然资源的地区似乎会更加坚决。

这可以解释图瓦的安静。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图瓦的民族主义者运动是相当发达并且和共和国的政府整合在一起。Kadir-Ool Bicheldei，这位民族主义者领导人是议会的主席。根据一位爱沙尼亚评论员所说，更激进的图瓦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明显地超越了波罗的海各国的前线”(Baltic states' Fronts)，并且包括将共和国的首都迁到一个图瓦人更聚居的城市。¹ 对于所有的这些，图瓦的领导人明确地拒绝了这种向莫斯科的挑衅，引用事实就是共和国对中央补贴的依赖超过了财政预算的 90%。由于熟练劳动力的流失所带来的消极的经济后果，图瓦官方积极地阻止俄罗斯人从城市地区向外迁移。²

叶利钦发现他 1994 年的访问实际上激励了图瓦人更加独立并且扩大和邻国中国、蒙古国的联系，而不是消减了图瓦人的分离主义企图。在一件特别不协调的事件中，Bicheldei 带领叶利钦参观了一个位于首都克孜勒的在建中的羊皮制造厂，并且提醒俄罗斯总统他们需要联邦的补助。叶利钦立刻许诺联邦将帮助建厂，在它的留言本中写道：“干得不错，我们将给你们钱！”³ 图瓦官方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小心地摇摆不定，就象本文的统计结果所呈现的那样，说明存在着一种本质的对潜在代价和利益的理性计算。

但是，究竟是关于什么的代价和利益呢？对于大多数族群地区，参照点好像不是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如果是为了独立的话，被俄罗斯区域所包围的地区当然要比有国际边界或者有功能性港口的地区更脆弱和谨慎。更确切地讲，参照点是更高层次上的自治——更低的中央税收、对自然资源的权利、更少限制的出口自由。能够从增加的自治中获得边际利益的族群地区最有可能要提出更广泛的要求。多数最坚定的分离主义地区的领导人想要的并不是真正的分离。

实际上，俄罗斯族群地区的要求和行动在很多方面类似于非族群地区想要从中央获得利益所使用的谈判策略和施压手段。⁴ 普通的州和边疆区最近几年已经要求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经济权利，并且有些已经单方面的宣布它们自己是共和国。一些非族群地区的领导人察觉到了分离行动主义所带来的利益，甚至表达了对非俄罗斯人口所带来的讨价还价能力的羡慕。坦波夫自治州的副州长最近开玩笑说，当他看见族群共和国所得到的好处，“我开始想，我应该引进鞑靼人到自治州来，凑足人口的 50%。”⁵

俄罗斯的经验给分离主义的比较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有关学术

¹ Alatalu (注释 60), 892.

² Stefan Sullivan,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Post-Soviet Tuv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8, No.1 (1995).

³ *Segondnya*, June 17, 1994, p.2, trans.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46, No.24 (1994), 18.

⁴ 在俄罗斯中央-地方关系中，族群地区和非族群地区被认为是并行的，更具体的分析参见 Deniel Treisman, "After the Deluge: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 Crisis in Post-Soviet Russia" (底稿,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⁵ 1996 年 6 月 16 日，作者和 Yuri N. Blokhin (第一任行政副州长，坦波夫自治地区) 的会面。



研究已经强调了在族群运动的出现和行动中理性计算的作用。¹ 自发的族群爆发似乎常常是分布结果的理性竞争的元素。(Seemingly spontaneous ethnic outbursts are often elements of a rational competition over distributional outcomes.) 特别在联邦制的国家,地方的抗议用来给中央政府施压,以便获得更多的资源分配,而且要求独立的威胁是强有力的抗议方式。² 在本文中提到的分离行动主义的范例表明在前苏联的俄罗斯有类似的逻辑。而且经验证据表明,通过地区领导人进行分离主义行动确实很有效,主要体现在能够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财政利益。³

尽管文化认同在俄罗斯的分​​离行动主义中也显然起了作用,但文化认同似乎是地区领导人的资源,而不是动员的力量。不管如何解释族群认同和族群组织的影响程度,它们都被转化成地区的政治策略,其转化方式被当地领导人对地区利益的理性计算所高度建构。这样的领导人不是非理性的原生性冲动的政治体现,而是复杂嵌套博弈中的处于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经纪人,他们在博弈中要考虑更大自治的经济利益、中央财政报复的风险、激起本地族群冲突的风险、获得当地组织支持的需求等等。如果俄罗斯的族群是易爆发的,那么爆发是一种内燃机似的可以控制的爆发。内燃机就是利用一个内部约束系统,在司机所选择的方向上产生运动。⁴

俄罗斯的分​​离主义与先进的经济发展、工业财富、出口能力、自然资源等等这些联系在一起,这反映了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地区的类似模式。在后共产主义的多族群国家里,似乎斯洛文尼亚要比斯洛伐克多。将来的研究必须解释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假设是: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族群地区中的分离主义不是意味着孤立,而是更迅速地一体化到世界市场中,也是减少中央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地区间再分配的转移。从一个蹒跚改革的国家脱离出来,这样就可以更多地向那些可能有利可图的地区请求支援,而不仅仅是只能向那些经济更不景气的、经济不发达的或者资源贫乏的穷邻居寻求帮助。

在东欧和前苏联,改革中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族群复兴出其不意地吸引了很多观察者,并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市民社会中新的认同定义可能已经形成,而共产主义秩序非常成功地摧毁了市民社会的痕迹,由此导致了族群要求的突然涌现,这种突然涌现反映出向着前现代式团结的退却。或者这可以通过一种工具性逻辑来解释,在改革的共产主义秩序中形成和发展的一套特殊制度中,族群形式的动员能够给行动者带来特定的好处。这篇文章的证据支持后面一个观点。共产主义联邦国家的族群管理结构明确地留下了一些亚单位(subunits),这些亚单位拥有制度资源,其制度资源和它们先前认可的族群地位成比例。与此同时,反对中央的抗议所形成社会认同使得族群地区在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具有了特定的优势。总之,证据对俄罗斯的族群政治提出一种工具性制度主义观点。驱动族群民族主义需求增长的不仅仅是族群认同和运动的力量,也是对能够获得的利益的理性计算。

(译者 孟红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博士研究生,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讲师)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 100871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于长江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

¹ 特别地参见 Bates(注释 1); 还可以参见 Rothschild(注释 18)。

² 关于这样的抗议在印度所扮演的角色, 参见 Subrata K. Mitra, *Power, Protests and Participation: Local Elites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India*(London: Routledge, 1992)。

³ Treisman 发现在 1992 年时, 早期宣布自治的俄罗斯地区在中央的财政转移和减免税中平均获得了人均近 19,000 卢布的报偿。参见 Daniel Treisman, "The politics of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in Post-Soviet Russi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July 1996)。Treisman 还用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中央政府平息分离主义的地方领导人通常是理性的; 参见 Treisman, "Crises and Stability in Federal States: A Game Theoretic Analysis"(底稿,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95)。

⁴ 形成对比的例子是类似“高速公路撞车事件”的族群关系, 例如车臣, 仅仅凸显了中央和族群地方之间的商谈妥协的总体趋势。

